

中原王朝对 11 世纪前湘西地区 认知的变迁研究^{*}

□ 谢晓辉

[摘要] 从华夏对非华夏的认知与定位,两者的互动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对湘西地区的记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尝试将湘西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前,中原王朝对于湘西地区的有效管控,基本上都还是士大夫们偶尔的理想或者后朝的建构。事实上,中原王朝也并不一定汲汲以求于当地的华夏化。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强势王权之间,配合山区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给多样性社会与族群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中有些进一步阶序化,发展为地方王权,湘西土酋也曾经做出如此努力。中原王朝也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来作为与其他王权的缓冲地带。

[关键词] 华夏;华夏边缘;盘瓠蛮;湘西;族群边界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5-0092-07

A Study on the Central Empir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nan before the 11th Century

XIE Xiao-hu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ko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Huaxia tribe confederacy understood and positioned non-Huaxia trib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accounts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nan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study shows, it is not until the Emperor Shen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1068—1077) that the central Empire attempted to bring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nan into its direct governance, while before that th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is region from the central empires had only remained as an occasional ideal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or an ongoing construction for the successors. Actually, it is not wise for the Central Empires to pursue the domestication in this region. The Balance between two or more local powerful tribe heads, combin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situ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provided space to the society of diversity and ethnic development, which was a buffer needed by the Central Empires against other local rulers. Some local powerful tribes developed their hierarchy and turned into the local rulers as the local trib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nan used to.

Key Words: Huaxia; Huaxia boundary; Panhu barbarian;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nan; ethnic boundary

* 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项目编号:6901924)。

什么是“中国”？如何“成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命题被认为不言而喻。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国际政治文化秩序的建立，学者们如马戎^[1]和葛兆光^[2]等纷纷孜孜以求于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王明珂在其近年的著作中，对既有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理论提出了极富野心的颠覆与重构，^[3]指出华夏的形成与扩张，就是把边缘族群“华夏化”，华夏边缘推移的进程。^{[4][5]}如何翠萍所言，在做如此浩大的解构中华民族史与少数民族文化史的工作中，需要更为仔细地对待不同区域的差异，充分考虑区域社会的脉络。^[6]西南地区整合入中国的文化与权力接触场景，限于早期文字记录的缺失，常常“莫可得而考”。^[7]

本文尝试通过湘西具体的历史发展，勾勒出11世纪前，即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在尝试开发湘西地区前，华夏边缘在地方上运作的历史情境；同时探讨湘西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南的“武陵民族走廊”，在唐宋时期土著社会的架构与运作。

一、从“武陵蛮”到“盘瓠蛮”

对于南方地区与华夏接触的历史场景，如何突破谭其骧先生所言之“莫可得而考”的局面，数十年来，随着地下新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思路的转变，学者们如王万隽、^[8]鲁西奇^[9]、魏斌^[10]等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做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本文意识到，无论是地下还是纸上的材料，在处理华夏与非华夏这一类议题上，都需要充分认识到材料产生的历史情境及其本身的局限，尤需慎重使用今人族群分类的体系与观念，通过某些风俗、语言、迁徙故事或族谱，去对应史籍中的一些族类描述，做民族溯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制造纵横几千年的族群系谱。

获益于已有的制度史、民族史研究成果以及近期的一些启发性探索，本文尝试从华夏对非华夏认知、互动的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记载。湘西是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今天概念中的湘西，从最具体的特定地域范围、族群种类，到抽象的地域文化内涵与认同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历代王朝与地方社会长时段的彼此认知、互动和建构的过程。本文非常认同谭其骧先生把东汉至隋开国前作为湘西地区与华夏互动的关键时间段之一的洞见^[7]（里耶秦简的出土，让学界振奋，虽然秦简尚未完全整理面世，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虽然里耶秦简，为了解湘西地区早期政治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但里耶地处楚国与秦国的交界地带，在当地设郡立县，主要是

出于战略考虑，一旦其战略据点地位消失，中原王朝在当地直接统治的格局就有若昙花一现。而秦简这类记录如何与湘西本土社会与文化真正相扣连，则期待更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学者们如陈伟^[11]、周振鹤^[12]，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3]等通过传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自东汉至隋开国，是华夏对湘西一带土著认知转变的重要时期。

在一个传世正史文献的叙述脉络中，今天被称作湘西的地方，是非常笼统地以南蛮的一支——武陵蛮的身份而被载入史册并广为学人关注。“武陵蛮”，是以西汉武陵郡之设而得名，然西汉虽有武陵郡之设，但史载阙略。自东汉以来，一方面文献中开始频频出现包括武陵蛮在内的南蛮时常构成对华夏威胁的记载，马援征武陵蛮的故事广为传播；^①另一方面，最迟到东晋，文献记载中出现盘瓠一说与武陵地区的土著相关联。^②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是华夏对于南方土著认知与分类的一个重要转变。这与华夏的扩张，并在新的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与他者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传世文献载盘瓠之说始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③在三国鼎立与“五胡乱华”的过程中，不少世家就此定居南方，盘瓠传说也有所变化与发展。^④东晋郭璞时，出现“狗封之国”和“狗民国”的记载。^⑤到稍迟出现的干宝《晋记》与《搜神记》，其传说不仅越来越丰满，而且与武陵、五溪、长沙等具体地域范围内的土著联系起来，视盘瓠为其始祖。^⑥故事由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此后在掌握汉文的知识阶层中广为传播。

除了对盘瓠神话的历时性考察，对其传说基本要素的分析同样有助于了解在同土著接触增加的过程中，华夏如何重新认知与定位这群他者。有关盘瓠传说的早期记载，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元素：其一是与高辛氏的关联，其二是盘瓠为犬。在目前，学界对高辛氏在五帝系谱中的位置还有颇多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到司马迁编写《史记·五帝本纪》的年

① 《东观汉记》《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 王明珂注意到盘瓠作为非我族类的祖先，有可能先跟位于东方海上某地的“狗封之国”有关，到了后魏，才开始指代湘西山居人群，《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161页。本文认为至迟到东晋已经有了这种关联，后文详。

③ 应劭《风俗通义》关于盘瓠的记载现已佚，此书在北宋时佚失大半，但宋代罗泌《路史》载：“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

④ 《魏略》。

⑤ 《山海经广注》卷二〇；郭璞：《玄中记》

⑥ 《晋记》《搜神记》。

代,高辛氏已经以帝喾的身份,作为华夏的始祖,被纳入三皇五帝的谱系。^{[14][5]}自东汉以来的早期诸种盘瓠的记载,都强调盘瓠与高辛氏的关系:或者作为高辛氏老妇的耳垢,或者通过以高辛氏之女为妻,建立了某种经由女性而非男性的、基于身体/血缘的关系,同时又强调盘瓠为犬。这在夷夏之分极为敏感的当时,既是试图重新定位与认知我者与他者,也是华夏系谱建构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除了确立在华夏谱系中既近犹远的他者身份,在礼仪与文化、赋税等义务方面的他者身份,也随着盘瓠传说的日益丰满而日渐明确。其中,最为系统的陈述是南朝编写的《后汉书》中关于盘瓠的记载。^①在这个被基本定型,同时又在后世文字传统中流布最广的盘瓠传说中,盘瓠子孙在礼仪与文化上都迥异于华夏:从服饰、言语、居住方式、生计模式到伦常(其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无一不是。同时,其社会结构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亦有别于华夏:一方面自有其君长,另一方面又受朝廷印绶,却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

从武陵蛮到具有共同始祖性质的盘瓠神话在文字传统中的完善与流布,是从华夏谱系、礼仪文化以及与王朝关系上,对南方土著的一次调整与认知。而这与地方割据之后,不少原来观念中的南蛮之地逐渐被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15][16]}华夏化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例如东晋名将陶侃就被时人骂为“溪狗”,直到其曾孙陶渊明时才不被人视为异族。^[17]武陵郡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分为若干郡,其建置时有兴废分合。同样在这个时候,士大夫们加深了对这些地区地理地貌的认知,如五溪蛮这一类称呼,就是基于对长江以南以沅水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水文地理的认知而出现。

唐开国以后,采用极为灵活与宽松的方式处理辽阔疆域的治理问题。鼎盛时期,除武陵山脉所在的台地地区未曾设州立县外,大部分平原地区都曾设立过正州或者羁縻州县。^②这样,“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成为华夏边缘南进过程中,对非华夏描述的重点。^③“莫徭”一词,也应运而生。至晚到隋唐年间,逐渐普及为对一群“不事赋役”“免徭役”的南方土著的称呼。^④这种族称的出现,明显王朝跟赋税体制下,对人群的分类有关。“莫徭”“徭”在当时士大夫的认知中,常常与盘瓠传说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獠”“獠”“玃獠”等专指某一类土著的称呼也开始出现在文本中,用以形容辰州境内的一些土著。^{⑤[18]}

尽管唐代在这些地区所能达至的管理程度值得怀疑,^⑥但不可否认,到唐末,一方面原武陵郡地几经兴废分合,已被细分为若干个州县;另一方面,在

两汉时期曾遍布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的西北部,以及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广泛地区的“武陵蛮”,也逐渐为专指武陵山脉地区的沅水流域土著人群的“五溪蛮”这一称呼所取代。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共同始祖性质的盘瓠蛮故事的定型,以及“莫徭”“徭”“獠”“獠”“玃獠”等进一步细化族类划分倾向的出现。

二、溪州之盟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传统资源的相对有限与地形地貌的复杂,形成了中原王朝对当地资源获取和华夏边缘推进的天然阻隔。一直到唐末,传世文献对于湘西地区的记载都相当有限,也很难真正了解其社会。^⑦唐末藩政割据,使得西南不少土著首领纷纷自署刺史,称霸一方。^⑧五代十国时期众国林立,马殷建立了以湖南为主要势力范围的楚国。^⑨在如此政治格局中,对五溪地区溪州彭氏土酋的关注不可避免,也因此留下了对当地土著社会认知的早期珍贵记载。

学界对于马楚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其中,马楚政权与溪州彭氏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来自江西吉州赤石洞的彭玕与彭城兄弟,在地方角逐中失利后投奔楚国。^⑩第三代楚王马希范娶彭玕的女儿为妻。^⑪而彭城兄弟即为后来统领溪州数百年的彭氏土酋之祖。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彭士愁于发起了对楚国的战争,被镇压,马楚与彭氏结溪州之盟。又因马氏以伏波将军

① 《后汉书·南蛮》。

② 《新唐书·地理五·江南道》。

③ 因为“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导致很多原来在税收体系下的人“逃亡入蛮”,对政府财政收入造成相当的冲击,《南史·夷獠下·荆雍州蛮》。

④ 《梁书·张缵传》;《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五·潭州条》。

⑤ 杨庭硕先生认为“玃獠”这一类称呼,是宋元以来外人与土著接触后对其自称的音译,但笔者认为这个接触记音的时间最晚可推前到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辰州条》。

⑥ 史籍对这些州县所属州境里数、户数以及户口数目也常常缺失不载,如《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辰州、锦州、溪州等条》。

⑦ 传世文献主要的关注点在两个方面:其一,因对当地资源的需求以及华夏化进程而引致的各类反应;其二,调整对当地土著在华夏谱系、礼仪文化、行政建置、人群划分上的认知与定位。

⑧ 《新唐书·南蛮下》。

⑨ 众国林立使得各个割据力量不仅垂涎于西南地区的丰富物产,同时也极力争取土著势力的支持。如被称为武陵峒蛮的雷满,为镇守荆南地区的高骈所争取拉拢,带领由诸蛮组成的土团军四处应战,《新五代史·雷满传》;更多的个案可见《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

⑩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三年七月庚辰条。

⑪ 《十国春秋》卷七一《文昭王顺贤夫人彭氏》。

马援之后自居,仿祖先故事,刻铭文铜柱,“以镇诸蛮”。^①

溪州铜铸铭文很早就被不少学者关注,但成果多集中在对铭文的校勘纠误、官制的考察,或者讨论民族学界一直关心的溪州彭氏的族源问题,其背后的关怀是土家族的族源。不少学者将讨论集中在彭氏土司族源的追寻上。其核心议题就变成了彭士愁是否为吉州刺史彭玠兄弟的后代,由此得出其族源的不同结论。本文认为,仅凭彭氏谱系并不能说明其族源,即便是了解溪州彭氏的族源也并不意味着了解土家族的族源。尽管如此,仍需要厘清一点史实,学界普遍接受的吉州彭城、彭玠兄弟为溪州彭氏之祖的观点有待商榷。其实,早在1939年,谭其骧先生曾提出彭玠兄弟与溪州彭氏无关,^[7]但冈田宏二在其论著中一一驳斥了谭先生提出的理据,^[19]学界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下文谨对谭先生的理据略加补充,并尝试回应冈田先生。

其一,冈田先生强调彭玠之女即楚王马希范之妻彭夫人在世时,彭氏家族在楚国举足轻重。彭夫人于天福三年(938)逝世后,“彭氏才幡然举起反楚大旗”,两者关系破裂。但是,冈田先生没有留意的是溪州彭士愁领众进攻楚国,始于天福四年(939)八月,^②九月楚国发兵征讨。^③马希范于同年十一月,效仿唐太宗在天策府文学馆置学士员之例,从各军中选出有才能的18人,定为学士,^④其中就有彭玠的两位儿子彭继英和彭继勋。^⑤按照冈田先生的逻辑,彭士愁为彭城之子,彭继英和彭继勋为彭士愁的堂兄。在彭士愁发动对楚战争之后,楚王仍重用他的两位堂兄,并擢为学士,实在蹊跷。其二,吉州彭玠投奔楚国后,被封为郴州刺史,经营郴州一带,何故忽然跑到当时尚未在楚国版图的溪州统领一方,成为“蛮酋”?梳理楚国在各地建郡立县的历程即知,溪州列入楚国版图是在溪州之盟后,而且仅仅是羁縻其首而已。^⑥吉州彭玠兄弟与溪州之盟的主角彭士愁,在楚国历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代以来关于楚国的记载对他们都有详细记载。如果彭士愁果真是彭城之子,为何直到明以前的所有史籍都不曾提及,反而是明清以来始有此说^[20]其实,所有支持彭城兄弟为溪州彭氏之祖的材料皆来自明清时期的史料。其三,溪州盟约中,有提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倘若彭城为彭士愁之父,则彭城为入溪州的第一代,何以解释“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并“历三四代”?

相对于这种基于血缘的族群与族源的讨论,本文更有兴趣了解当时人的观念,以及这些称呼或者分类如何出现在士大夫们的记载中,尝试探讨马楚

政权与溪州彭氏的互动中,双方如何认知、定位彼此的关系。

溪州铜柱铭文绝大部分是当年的盟约,一小部分为后代加刻。盟约大致包括四部分:其一介绍溪州彭氏,其二为历代王朝治边理念及溪州之盟的来龙去脉,其三为双方达成的誓约,其四为立誓双方的题名。铭文有两处提到溪州彭氏:

牂牁接壤,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勤,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⑦

很清楚,盟约依旧是在用盘瓠子孙来定位这群土著。需要强调的是,溪州铜柱的盟约,不是楚国士大夫们在书斋里对他者的单向描述与定位,而是溪州土酋们共同参与签订的双边盟约。此盟约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土酋们的诸多权益。微妙的是,这些土著大酋,似乎容忍了这种定位和描述,这恰恰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

关于双方所达成的盟约,铜柱铭文中记载:

右据状:溪州静边都,自古以来,代无违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当都愿将本营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只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该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执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愆。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攻讨。若有违背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

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

这段铭文分别是溪州土酋和楚王的盟誓。作为战败方的溪州诸土酋们做出如下承诺:其一,“归名王化”,按旧额缴纳税课;其二确保不再骚扰楚国各州,掠夺人口;其三,允许楚国来采伐收买土产,不再

① 《资治通鉴·后晋记三》,天福五年二月庚戌条。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八月乙酉。

③ 溪州铜柱铭文:“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十一月戊子。值得一提的是,溪州铜柱铭文就是当时18位学士之一的李宏皋所撰。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十国春秋》卷六六;路振:《九国志》卷一一 楚,彭玠条。

⑥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五年春正月乙未。

⑦ 铭文为笔者2004年至2009年期间多次走访湘西时,在永顺王村实地抄录而得,其中有参考比照冈田宏二在《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一书中对铭文内容的考证。

包瞒私占；其四，五姓酋长和境内州县官员有犯，自会申报依法惩处，如果没有其他罪行，请楚国不要发兵征讨。其五，如果有违誓言，情愿被征讨。而战胜方楚国则以土酋恭顺为条件做出如下两大承诺：免掉科徭，本地的赋租，可以留为自用；本地的兵士，也不派差调用。

非常明显，即便是在楚国战胜的情况下，楚国并无意在溪州地区建立直接统治，对实现华夏化汲汲以求，而只是羁縻其首。盟约与盘瓠传说所确定的框架如出一辙：一方面土著酋长在溪州内部统治的正统性得到承认；溪州内部事务，楚国不得轻易干预，如果溪州土酋恭顺，楚国既不在溪州抽调兵士也不征收科徭。其实，楚国不仅承认他们自署刺史的官职，同时还封给荣誉性官职；^①另一方面溪州土酋必须“归名王化”，不再扰境骚民，楚国保持获取当地资源的权利。即盘瓠传说中一方面“自有其君长”，另一方面又“受朝廷印绶，却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

溪州铜柱的誓约铭文为了解湘西地区早期的社会架构与运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铭文提到“都”“营”“团”“保”“五姓主首”和“州县执掌”这一类字眼，同时原刻铭文的题名中溪州方面有19个官职姓名，其中彭氏8人，田氏4人，覃氏3人，龚氏2人，向氏1人，朱氏1人，即所谓“彭士愁与五姓归明”。^②本文认为，铭文为楚国学士李宏皋所撰，李宏皋是用他在楚国的那套知识体系和语言来认知、描绘土酋社会，题名中溪州土酋中那套非常整齐的华夏化的官职设置值得怀疑。^{③[20]}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定，溪州铜柱铭文中所看到的土酋间的联盟，不是一个单纯的临时性战争联盟，而是一个以彭氏为核心主导、田氏次之的跨地域联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溪州铜柱铭文的题名中，首列现任溪州刺史彭士愁之名，紧跟其后是罗列了三位前溪州刺史之名。这三位前任的溪州刺史中，有两位姓彭，一位姓田。彭氏土酋与田氏土酋的结盟关系，在延续至今的地方传说与神明崇拜传统中还有所体现。^[20]在这个地域联盟之下，有非常明显的官僚层级架构，并拥有独立的军事组织。

三、“都誓主”到“如意大王”

溪州铭文所展示的与王朝的关系、社会结构等，总体而言在宋初得到了延续，而爬梳宋代零星的材料可以得知，士大夫们所理解的土著社会内部的行政设置及官员承袭制度。《宋会要辑稿》称：

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下溪州刺

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④

宋代将沅水下游地区称为北江地区，主要包括沅陵县以西的酉水流域，北至澧水上游一线。《宋会要辑稿》指出北江地区最大的土著首领是彭氏，其下设有二十州，皆有刺史一类官职的设置，在这所有的二十州之中又设有“都誓主”一职，由下溪州刺史兼任，统领其他各州。二十州较之溪州铜柱铭文所列州县在数字上有所增长，然而其官僚层级架构，其实就是跟溪州铜柱铭文中的架构类似。对这二十州及其官员的设置，宋人彭百川指出：

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六州，曰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十一州。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俱自补置。^⑤

彭百川不仅列举了由彭氏所统领的这二十州的具体所指，而且指出每州都设有一些固定的官职。官职的设置已经有别于溪州铜柱铭文的记载，但与其一致的是这些官职，其实是土酋内部决定其补置程序及人选，而不是由宋朝来决定任免。至于内部官员及都誓主的产生程序，《宋史》载：

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会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⑥

可见，在士大夫的概念中，以彭氏为首的北江地区，有一个系统的官僚架构与承袭制度。其内部官员的产生是由都誓主统领各个酋长来会议，而候选名单基本上是从其亲族中产生。虽然是从亲族中产生，但并不是严格的父子相传，更没有长子继承的概念，甚至其亲党也有可能获得承袭。理论上，承袭的结果要经由辰州得到中原王朝的最后确认，但这个确认的过程不是在京城而是在辰州完成的，得以袭替的人也只需要“隔江北望拜谢”。也就是说在宋代由下溪州都誓主彭氏所统领的这二十州还是跟溪州铜柱所确定的关系一样，羁縻其首而已。有宋一代辰州虽然幅员辽阔，号称经制州，但其实真正经制只

① 溪州铜柱铭文题名。

② 《九国志》中也提到在溪州派人去楚国乞降的时候，为彭世愁的儿子彭师嵩“帅诸蛮酋长田洪赞、覃行方、向存佑、罗君富等，携牌印纳款于劬”，《九国志》卷一一《楚臣传·彭师嵩》。

③ 五代时期如此高度的华夏化值得怀疑。其实，溪州地区的确有他们一套本土的官僚设置，如用汉字记土音的“舍把”。另外直到明初，还有土司及其直系家属没有汉姓汉名的情况。

④ 《宋会要辑稿》卷四三三〇，蕃夷五之八一，天禧二年条。

⑤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

⑥ 《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诸蛮传》。

是沅水以东的沅陵等少量地区,沅江在某个程度上成为时人心目中的“化外”与“化内”的某种分界线。但其实即便是在辰州,宋初也是任命徭人来当辰州刺史。《东轩笔录》有记:

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恶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太祖招之阙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蛮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戴异恩……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堞,捷如猿猱。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徕之美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①

可见,宋初的辰州跟羁縻州几乎无甚差别,同样是任用当地酋长做刺史,通过他们来使土酋归名王化。辰州刺史在其域内可以自己任命官吏,拥有一州的租赋。

一直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一个文字的脉络下,士大夫在华夏谱系、社会与政治地理上,对湘西地区的定位与认知,这只是一个层面的历史。湘西地区在一个汉文文献的脉络下被不断拉近与华夏的距离,并不一定表示湘西土著社会一直对摆脱华夏边缘、归顺中原王朝孜孜以求,它也会有其相当的主体性。成书于南宋熙宁年间的《桂海虞衡志》对桂林附近的南蛮有如下记载:

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②

可见,宋代西南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大理国、吐蕃,还有罗殿、自杞等以国为名的地方政权。其中罗殿还有自己的文书公文系统,采用的大致就是今天被称为彝文的文字,有自己的官僚、礼仪与认同体系。^[21]然而,汉文文献对罗殿国所载无几,直到近年彝文文献被重视,罗殿国王权曾经辉煌的历史才被发现。

宋代西南地区在庞大的大理国、吐蕃与宋王朝之间,有诸如罗殿、自杞等诸多地方王权。通常在两个以上较为强势的王权之间,给多样性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尤其是在西南这类生态地理环境当中,更是如此。^[22]其中,有部分地区进一步阶序化、官僚化,并发展成为地方王权,如自杞国、罗殿国等,而有些则有若世外桃源,保持与既有国家或自立成国的距离。不论如何,在这样的格局中,左右逢源常常是生存发展之道。查尔斯·巴克斯的研究表明唐代的吐蕃兵强马壮,一度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使

包括南诏在内的西南一些国家向其朝贡。^[23] Herman 的研究指出位于唐与南诏之间的慕俄格王国,在唐与南诏的战争中,左右逢源以拓展其领地。^[24] 位于中越边境的侬智高所领之广源州侬氏,也曾经游走于宋朝与交趾两个王权之间,作为羁縻州臣服于宋朝的同时,给交趾服役,效忠于交趾。侬智高之所以可以让后人了解到这部分的历史,就是因为他挑战宋朝,率兵从广西一路攻到广东,兵临广州城下。^{③[25]}

湘西地区,同样位于宋朝与西南各个王权之间,其有无游走于两端,尚待史料尤其是西南各王权自身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困难在于,湘西地区,今天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虽然都有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却并未形成他们本民族的书写系统。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在汉文文献的记载中,看出以彭氏为首的溪州地区,有进一步阶序化的趋势,一度形成跨地域联盟,形成具有一定统合性的文化体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文献中已经透露出,在多“国”林立的西南政治格局中,湘西甚至还一度传出有人自称“如意大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先是彭仕义纳其子师宝之妻,师宝忿恚,遂与其子师党举族移辰州,告其父之恶。言仕义尝设誓下十三州,将夺其符节,并有其地,贡奉赐予悉专之,自号如意大王,补置官署,谋为乱。^④

此事《宋会要辑稿》《宋史》等皆有载,^⑤事情缘于嘉祐二年(1057)下溪州都誓主彭仕义与其子彭师宝交恶,彭师宝赴官府告发了彭仕义兼并其他州,夺其符节,并在溪州地区称王,补置官署,自号“如意大王”。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彭仕义被告发“自号如意大王”一事,官府可能不会如此快了解溪州内部有人在兼并其他地方,扩张领地,进一步补置官署,自号为王,更不会出兵对彭仕义称王一事加以干预。从西南地区的格局,尤其是溪州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力格局与官僚层级的传统来看,下溪州彭氏进一步扩张领地,自置官署,由地方联盟中的都誓主进一步发展以建立地方王权的努力,并非偶然。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从华夏对非华夏的认知与定位,两者

①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此事亦见于《宋朝事实类苑》、《续资治通鉴长编》、《方輿胜览》以及元人所著之《宋史》等。

②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③ 《宋史·蛮夷三·广源州》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九月乙亥条。

⑤ 《宋会要辑稿》卷四二二,蕃夷五之八四,嘉祐二年条;《宋史》卷493《西南溪峒诸蛮传》。但《宋史》称其事发于至和二年,当有误。

的互动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对湘西地区的记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尝试将湘西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前,中原王朝对于湘西地区的有效管控,基本上都还是士大夫们偶尔的理想或者后朝的建构。事实上,中原王朝也并不一定汲汲以求于当地的华夏化。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强势王权之间,配合山区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给多样性社会与族群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中有些进一步阶序化,发展为地方王权,湘西土酋也曾经做出如此努力。中原王朝也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来作为与其他王权的缓冲地带。^①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再到更为复杂的族类划分,不仅经历了其所指代的土著所聚居的地理范围变更的过程,更是经历了一个华夏边缘与政治地理边缘推移、变更,土著人群在汉文文献的脉络中被重新定位、认识,并被赋予不同的身份标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夏的边缘不一定总与社会及政治地理的边缘相吻合,族类的身份也保持着高度的流动性;同时,各个阶段用以划分边界,重新认知他者的机制也不尽相同。有意思的是,虽然华夷之辨重在文化而非血缘,但往往会沿用一套血缘的话语。这种强调在华夏谱系中的定位,逐渐转到强调王朝赋役体制下或者细致化的风俗描述而导致的标准各异的族群分类。☒

[参 考 文 献]

- [1] 马戎.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 [2] 葛兆光. 何为中国: 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 [3]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 允晨文化, 1997.
- [4] 王明珂. Searching for Qiang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 Inner Asia, 4: 1 (2002)
- [5]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6] 何翠萍. 评《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 汉学研究, 2004, (22)(1).
- [7] 谭其骧. 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与湖南人由来考[A]. 长水粹编[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8] 王万隽.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族研究综述[A].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9] 鲁西奇. 释“蛮”[J]. 文史, 2008, (3).
- [10] 魏斌. 单名与双名: 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J]. 历史研究, 2012, (1).
- [11] 陈伟. 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J]. 历史研究, 2003, (5).
- [12] 周振鹤. 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05, (5).

- [1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里耶发掘报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 [14] 王建文. 帝国秩序与族群想象——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J]. 新史学, 2005, (16), (4).
- [15] 傅乐成. 孙吴与山越之开发[A]. 汉唐史论集[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 [16] 伍新福. 中国苗族通史[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 [17] 陈寅恪. 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A].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M]. 北京: 九思出版社, 1977.
- [18] 杨庭硕. 人群代码的历史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19] 冈田宏二. 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20] 谢晓辉. 联姻结盟与谱系传承——明代湘西苗疆土司的变迁[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2, (13).
- [21] 温春来. 从“异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22]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3] 查尔斯·巴克斯, 著, 林超民, 译. 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24]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M].
- [25] James Anderson. The Rebel Den of Nùng Tri Cao: Loyalty and Identity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J]. Singapore: In association with NUS Press, 2007.

收稿日期 2014-03-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谢晓辉(1978~), 女, 湖南湘乡人,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研究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族群与边界, 边疆史。E-mail: xxiaohui@ust.hk

① 历史上曾数度出现土酋愿意献土, 而中原王朝不愿将其纳入州县体系的故事, 这其实是与 James Scott 所讨论的土著族群因为要逃避王朝国家的统治而主动逃离社会的理论相违背,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